

拜厄特与沈从文的向阳生命美学与伦理关怀探究

Exploring the Heliotropic Life Aesthetics and the Ethical Concern as Conceived by Both A. S. Byatt and Shen Congwen

金 佳 (Jin Jia)

内容摘要：拜厄特与沈从文的“邂逅”看似偶然，实则源于两者在阅读与地理探索中，将“向阳性”与生命、自然、艺术和文化融合，形成抵御生命焦虑与民族困境的“向阳生命美学”。学界对其“向阳想象”或“生命诗学”虽有单方面研究，却未将两者视为整体，更缺乏伦理维度的思考。本文从他们共同的“向阳性”入手，探究其生命美学的核心特征与书写形式，揭示其中蕴含的伦理关怀。两位作家在对生与死、光明与黑暗、静默与流动、远行与归家等生命困境的反思中，实现自我与他者的换位，完成与世界的联结。他们依托多元文化交汇的“向阳之旅”，以不同的视角和方法，为重构开放多元的“向日隐喻”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艺术范式。

关键词：拜厄特；沈从文；向阳生命美学；生命书写；伦理关怀

作者简介：金佳，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英国文学与文化批评。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代英国小说中的花园书写与共同体重构”【项目批号：23BWW051】阶段性成果。

Title: Exploring the Heliotropic Life Aesthetics and the Ethical Concern as Conceived by Both A. S. Byatt and Shen Congwen

Abstract: The encounter between A. S. Byatt and Shen Congwen, though seemingly serendipitous, is rooted in their integration of “heliotropism” with life, nature, art, and culture in their journeys of reading imagination and geographic discoveries. This integration formed a “heliotropic life aesthetics” that resists individual existential anxieties and national survival crises. However, while existing scholarship has examined their “heliotropic imagination” or “life poetics” respectively, it has largely overlooked their convergences as a whole and neglected the crucial ethical dimension. By looking into their shared “heliotropism,” the present paper seeks to explore the core characteristics and narrative forms of their life aesthetics, specifically revealing its inherent ethical concern. It is through their enquiries into such paradoxical issues as life and death, light and shadow,

stillness and flux, home-leaving and home-coming, that the two writers achieve the transposition of self and the other, thus forging a profound connection with the outside world. Drawing strength from their “heliotropic odyssey” across intersecting cultures and ideas, they offer rich intellectual resources and artistic paradigms for reconstructing an open and diversified “heliotropic metaphor.”

Keywords: A.S. Byatt; Shen Congwen; heliotropic life aesthetics; life writing; ethical concern

Author: Jin Jia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China), specializing i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studies (Email: stothia@163.com).

英国当代作家拜厄特（A. S. Byatt）曾直言她的作品具有“向阳性”（heliotropic），即“逐日而行”的特性（*The Shadow of the Sun* xiii）。她不仅塑造了一系列逐日而行、浴火重生的人物形象，而且还跟众多“向阳而生”的文学艺术大师有过交集：从她对布莱克（William Blake）“向日葵”之歌的呼应，到对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闪亮眼睛”（“flashing eyes,” *Kubla Khan*）和“向阳崇拜”（sun-worship）的关注，再到她与“太阳之子”梵高的对话（*Passions of the Mind* 282、284），以及她欣赏尼采（以太阳神为例）对“生命的肯定与超越”（Hensher, “A.S. Byatt, The Art of Fiction No.168”），她的文学道路堪称一场向阳之旅。

然而，学界在解读拜厄特的向阳想象时，未能充分认识到她的“向阳性”不仅根植于其自身的生命美学思想和伦理关怀，还与沈从文的“邂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位作家虽然从未谋面，拜厄特却因沈从文作品中类似的“向阳性”而产生了强烈共鸣，二人因此实现了心灵交融。

一、向阳性与向阳之旅的缘起

“向阳性”（heliotropic/heliotropism）一词源于向阳植物¹，起源于拉丁文“hēliotropium”和希腊文“hēliōtropion”，由“helios/ἡλιός”（太阳）和“trōpos/τρόπειν”（转向）两词合成，特指植物生长过程中对光源的自然倾向。²从古希腊时期开始，“向阳性”逐渐成为西方哲学传统中的一个核心隐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开启的“向阳喻说”（heliotropic metaphor）³影响了整个西方形

1 天芥菜属紫草科，后来进入英语后特指向日葵、金盏菊等向阳植物。

2 参见 Robert K. Barnhart, ed., *The Barnhart Dictionary of Etymology*, New York: The H.W. Wilson Company, 1988, 474.

3 参见 杨乃乔：“终极缘光：西方诗学本体论的‘向日式隐喻’”，《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1999）：62-73。

而上哲学的发展¹，他们崇尚“光明”(light)，以此象征至善、真理、理性、知识、启蒙和秩序等核心价值，而“黑暗”则被视为混乱与无知的象征。²这种二元对立构成了西方哲学的“向阳性”传统，指向了一个中心化、封闭的终极目标(即“逻各斯中心主义，德里达称之为“白色神话”³)。尼采批判了这一传统，认为它压制了个体“五光十色”的灵魂与生命力⁴，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等人也对此质疑，批判西方哲学家将自己的文化和语言特征视为普遍的理性形式，却忽视了其他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⁵

除上述哲学家以外，许多文学家也赋予“向阳性”以新的内涵。从乔叟(Geoffrey Chaucer)和马肖(Guillaume de Machaut)等人的向阳诗性隐喻⁶，到现当代的文学创作，都旨在突破对理性之光的单一追求，而将“向阳性”与生命、自然和艺术融为一体。这种交融业已成为一种带有强烈伦理色彩的文化使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伦理”(聂珍钊，“人文研究的科学转向”566)。正是带着高度的文化/伦理使命感，一些优秀文学家(包括拜厄特和沈从文)引入了“负面美学”⁷的视角，探讨光明背后黑暗、痛苦和死亡的意义。他们不再将“光明”视为唯一的真理，而是将其与黑暗/阴影视为生命的两面，共同构成存在的完整性。因此，上述“向阳性”的解构与重构不仅是对西方哲学传统的批判，更是对人类存在意义的重新探索。在这一过程中，拜厄特与沈从文的贡献不容忽视。拜厄特通过深入挖掘历史和文化，揭示个体在广阔世界中的位置和意义，以及生命如何在复杂多变的逆境中向阳重生的毅力；而沈从文则通过对湘西文化的细腻刻画，展现人与自然、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表达了对生命本质的追问。这种精神意义上的“邂逅”，为重构“向阳性”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艺术表现形式。

1988年，拜厄特第一次来到中国，而就在同一年，沈从文去世。此后二十多年里，拜厄特阅读了大量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作品，并坦承自己受沈从

1 参见 Kevin Corrigan, “Light and Metaphor in Plotinus and St. Thomas Aquinas,” *The Thomist: A Speculative Quarterly Review* 2 (1993): 187.

2 参见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277页。

3 参见 Jacques Derrida and F. C. T. Moore, “White Mythology: Metaphor in the Text of Philosophy,” *New Literary History* 6 (1974): 5-74.

4 参见尼采：《善恶的彼岸》，朱洪译，北京：团结出版社，2001年，第198页。

5 参见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陈嘉映等译，2014年，第154-155页；Jacques Derrida and F. C. T. Moore, “White Mythology: Metaphor in the Text of Philosophy,” *New Literary History* 6 (1974): 10-14.

6 参见 Peter W. Travis, “Chaucer’s Heliotropes and the Poetics of Metaphor,” *Speculum* 2 (1997): 406-407.

7 参见 Sigmund Freud, “Uncanny,” *The Critical Tradition: Classic Texts and Contemporary Trends* (Third edition), translated by James Strachey, Boston: Bedford/ St.Martin’s, 2007, 514-532；另参见童明：“西方文论关键词：暗恐／非家幻觉”，《外国文学》4 (2011)：106-116。

文影响，创作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短篇小说。¹这纯属巧合，还是心灵契合？

拜厄特热衷于“远行”，正如她所喜爱的布莱克那样（*Passions of the Mind* 132）。后者在《啊，向日葵》（“Ah! Sun-flower”）中把世人比作向日葵枝干，身陷于泥土之中，而灵魂却像向日葵的圆盘那样追随太阳的步伐，“向往甜蜜、金色的住处，作为一生旅途的归宿”（Blake 46）。该诗暗示人们超越自我，追寻“不可企及的光明之境”（张德明 6），即开阔的境界和更多元的思想。可以说，拜厄特的“向阳之旅”始于阅读体验中的“神游”。她自称“贪婪的读者”，就像尼古拉斯·莎士比亚（Nicholas Shakespeare）所说，宛若一只“花园里博采众长的蝴蝶”，致力于“编织一张包容她所读、所见、所思的巨网”（qtd. in Kelly 116）。除博览本国作家的经典之作外，她还穿梭于外国作家（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普鲁斯特、马拉美、沈从文等）笔下的世界，并多次感念于这类“邂逅”。²然而，她并未深入谈论过她与沈从文的交集，因此现存相关研究基本忽略了这段缘分。

跟拜厄特一样，沈从文喜好在多种异质文化中从事“思想旅行”。用他的原话说，他致力于“让生命从各个方面充分吸收世界文化成就的营养”（“抽象的抒情”9）。恰如汪曾祺所言，“沈先生书多，而且很杂，除了一般的四部书、中国现代文学、外国文学的译本、社会学、人类学、黑格尔的《小逻辑》、弗洛伊德、亨利·詹姆斯、道教史、陶瓷史、《髹饰录》、《糖霜谱》（……）兼收并蓄，五花八门”（汪曾祺 264）。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沈从文熟谙薄伽丘、小仲马、歌德、狄更斯、契诃夫、卢梭和尼采等人的作品，甚至受路易斯（Lewis Carroll）的《爱丽丝梦游仙境》启发，创作了《阿丽思中国游记》。³

沈、拜二人虽从未谋面，却有着相似的向阳性冲动，即穿梭于想象世界和现实世界，由局促的个人空间走向“广阔而新鲜”的天地（沈从文，《从文自传》207）。拜厄特迫切想要离开原生家庭乏味无趣的窒息环境（她出生于一个贵格教派家庭）⁴，她的足迹遍布德国、意大利、瑞典、冰岛、美国和中国等；而沈从文也“渴望到日光下去认识这大千世界微妙的光”和“稀奇的色”（《从文自传》36）。从早年的逃学、背离湘西，到逃离北京阴暗狭促的“窄而霉小斋”，他庆幸自己“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从文家书》2）。他的足下之行与阅读之旅相辅相成，在“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从文自传》34-49），从而使他“走向世界，为越来越多的读者和文学研究者关注”（凌宇 1）。

那么，在上述向阳之旅背后，有何社会历史原因呢？列维-斯特劳斯（Claud

¹ 参见徐蕾、拜厄特，“神话·历史·语言·现实：A. S. 拜厄特访谈录”，武畅译，《当代外国文学》1（2013）：161。

² 参见拜厄特的三部论著（*Passions of the Mind*, 1993; *Unruly Times: Wordsworth and Coleridge in Their Time*, 1989; *On Histories and Stories: Selected Essays*, 2000）。

³ 参见沈从文：《阿丽思中国游记》，海口：南海出版社，2000年，第3页。

⁴ 参见A.S. Byatt, *Passions of the Mind: Selected Writings*, London: Vintage, 1993, 14-15.

Levi-Strauss) 的一段话可以带来一些启示：“由于大发现时期的航行结果，一个曾经以为自己完美无缺、并处在最完美状态的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并非是孤立的，而只是一个更广大的整体的一部分，而且，为了了解自我，不得不在这面新发现的镜子上琢磨自己那不易辨识的影像”(398)。此处，自我“不易辨识的影像”其实源自“小我”和“大我”的伦理焦虑。对于拜厄特和沈从文而言，“远行”固然缘于个体生命焦虑，但更缘于社会文化焦虑，即对时弊的忧思。拜厄特曾因缺少生气的家庭和疾病而痛不欲生，成家后又受到大学、社会对已婚女性的排挤，还遭遇了独生子死于车祸的悲剧。沈从文有着相仿的经历：他目睹民不聊生的惨象，而军队还借“清乡剿匪”之名，敲诈屠戮百姓(《从文自传》174-175)。他将当时的生命个体比作“花园中的盆景”，“被人事强制曲折成为各种小巧而丑恶的形式”(《向阳而美》66)。他曾在“孤立思维苦闷中挣扎”和“窒息”，并意识到“得想办法自救”，“另外一个地方还有份事业待我(他)去努力完成”(《从文自传》217)。

固守家园，还是走向世界？这是个体的伦理困境，更是一个有关民族存亡的社会伦理危机。二战后的英国面临民族身份认同危机，英政府推出一系列维护“民族文化纯正性”的活动，而拜厄特却对此存疑，并以小说《花园里的贞女》(The Virgin in the Garden, 1978)这一题目隐喻对“文化纯正性”的警觉，抨击由岛国情结形成的文化自恋和排外心理。整部小说演绎了对于文化思想封闭/僵化的焦虑。沈从文虽处于不同国度，却也具有相似的焦虑：他把中国近现代政治问题归结为民族生命力的保守，并认为“中国问题可说与世界问题相同”，若一个民族仅把“保存文化”作为口号，而不为“未来生存”努力，就必将沉溺乃至毁灭于“过去的光荣”(“谈进步”484)。他始终强调，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文化是整体的，不是孤立的”(《从文自传》184)。

正是出于个体生命和社会文化的双重伦理焦虑，拜厄特和沈从文都寻求“用文字故事来给人生作一种说明”，从而“表现人类对崇高光明的向往，以及在努力中必然遭遇的挫折”(“白话文问题”63)。换言之，他们都肩负着伦理责任。

二、“向阳生命美学”里的心灵应和

拜厄特与沈从文的生命美学独具特色，其向阳性则是区别于一般生命美学的重要特征。

两位艺术家的向阳生命美学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共同特点：1) 不仅突出生命的向阳性，即对光明、希望和美好事物的追求，而且探索生命中的非理性因素，如本能、情感、直觉和超自然的神秘体验；2) 强调生命与自然的有机整体性，认为生命只有与自然和谐共存，才能焕发生机；3) 凸显生命的流动性、开放性和多样性；4) 深切表达对个体生命/文化困境的伦理反思，关注生命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赋予生命美学深刻的伦理内涵和社会价值。此

处的“伦理反思”是“伦理选择”的结果，“正是伦理选择赋予人类理性与伦理意识，从而最终使他们成为伦理生物”（Ni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386）。

然而，以往学界的相关研究要么仅聚焦于“向阳想象”（heliotropic imagination），要么局限于“生命美学/诗学”视角，未能将两位作家的向阳诉求视为一种完整的生命美学形态。长期以来，拜厄特的向阳性常被误解为对男性权威的依附。例如，坎贝尔（Jane Campbell）声称，拜厄特笔下的女性人物在经受磨难之后开始正视太阳的光芒，象征着她们在男性智慧主导的社会中获得智慧。¹然而，拜厄特对“向阳性”却有自己的阐释：

我的写作具有向阳性（……）我在尚未完成的博士论文中，谈到新柏拉图主义的创世神话，其中太阳代表雄性逻各斯，它穿透雌性的大地，带去生命与存在的形式。这一解释令人振奋，因为单从物理层面来看的确如此，生命的存在一定有赖于阳光；另一方面却让人郁闷，因为此种类比纯属谬误，太阳与男性没有必然的联系，地球与女性也并不相干。（*The Shadow of the Sun* xiii）

在小说《太阳的影子》序言结尾，拜厄特进一步阐述自己的向阳美学：“我担心自己的光芒很微弱，缺少温度（……）然而，我就从那儿出发，走向沐浴在阳光中的谷物女神化身伊丽莎白女王，走向梵高画中快乐劳作的收割者，走入《占有》中诗人艾什笔下的北欧生命史诗（……）”（*The Shadow of the Sun* xv）。可见，拜厄特的向阳想象完全突破了性别界限与个体生命，直指“人类整体生存状况”（Campbell 2）。正如她所言：“我们应该认识到自身之外存在着一些真实的东西——我们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并非全部”（*Strange and Charmed* 7），这一观点彰显其对万物生命的关照。与此相仿，在已有的相关研究中²，沈从文生命美学中的向阳属性常被忽视，它兼具生命与阳光交融的生物学趋光性，以及精神层面的开放性和浴火重生能力。因此，将向阳性纳入二者生命美学探讨，对揭示如下问题意义重大：究竟是哪些具体特质促使他们产生了心灵应和？

拜厄特的向阳生命美学源于她对生命意义多元化的拷问，在《天使与昆虫》（*Angels and Insects*, 1992）等“新维多利亚小说”中体现为对达尔文主义与唯灵论的反思。她认为达尔文挑战了基督教创世说，促使人类重新审视生命的起源及其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但并未完全接受达尔文主义，而是担心其将

¹ 参见 Jane Campbell, *A. S. Byatt and the Heliotropic Imagination*, Waterloo: 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 Press, 2004, 1-2.

² 在过去近 30 年期间，围绕沈从文“生命美学”主题的相关研究论文在知网上多达百余篇。较有影响力的著作有：吴投文：《沈从文的生命诗学》，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 年。

人类意识、理性等视为纯粹进化产物，从而否定超自然解释。¹同时，她对19世纪唯灵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赞同这种对于超自然现象的热爱“植根于人类心灵深处”（Noakes 26），挑战了“唯理是尊”的传统向阳隐喻。在两大思潮的碰撞中，拜厄特重构了生命意义的多元维度。同样，沈从文也将生命置于至高地位，提出“神在生命中”的观点（“爱与美”360）。他在《湘行散记》和《神巫之爱》等作品中，再现巫性文化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与敬畏，反映了人类生命中那些被边缘化和超越理性范畴的神秘力量，也体现了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和向往。

此外，他们对生命的敬仰源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认识，这在他们的向阳性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拜厄特认为，自然万物一体相生，她曾引用柯勒律治的万物合一生命观，强调“人类、林木、鸟类及世间万物是一个和谐的整体”，并将这种观念视为“敬奉的神殿”（“A.S. Byatt, *The Art of Fiction* No.168”）。这种大生命观还体现于她的《梵高：死亡与夏天》一文，后者赞扬“太阳之子”梵高在法国南部阿尔创作的系列画作，称其“向阳/向死而生”，即同时融合了对生与死的双重思考（*Passions of the Mind* 296）。她还在小说《静物》（*Still Life*, 2003）中多次嵌入“向阳隐喻”，如梵高画笔下的向日葵（soleil）²、烈日下的收割者和播种者，以此呼应画家对生命的激情和敬仰。³这些隐喻不仅展现了向阳性的美学价值，也体现了拜厄特对生命意义的深刻思考。

同样，沈从文的生命美学也与大自然水乳交融，其向阳性贯穿对自然和阳光的深情挚爱。他坦言“一部分生命竟完全消失在对于一切自然的皈依中”（《向阳而美》119），更感叹生命“交互溶解在光影中”（《向阳而美》101），渴望在“朝阳炙晒中感到新生”（《向阳而美》48）。他以夸父“迎赶日头”自喻，强调人类应“从阳光中取得营养和教育”（《向阳而美》91-92）。沈从文还曾直言自己的不少作品“向阳而生”，如《月下小景》《八骏图》《自传》和《边城》：“梧桐树下面，见朝日阳光透树影照地下，纵横交错，心境虚廓，眼目爽快，因之写成各书”（《向阳而美》66）。这些作品都体现了向阳性的美学追求。

至此，我们已深入沈、拜二人生命美学的核心，二者都追求从“向阳而美”到“向阳而生”的蜕变，并将其化作灵动的生命书写（life writing），由个体叙事“拓展到对人类、文化与自然之间关联的探索”（贺秀明 107）。还须一提的是，他俩都受了尼采的影响，这进一步折射出他们的心灵契合：拜厄特欣赏尼采对“生命的肯定”（Hensher, “A.S. Byatt, *The Art of Fiction*

¹ 参见金冰：《维多利亚时代与后现代历史想象：拜厄特“新维多利亚小说”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1页。

² 在法语中，向日葵和太阳共用同一个单词“soleil”。

³ 参见 A.S. Byatt, *Still Life*, London: Vintage, 2003, 132.

No.168”），而沈从文则把尼采视为生命书写的巨擘，能够“除旧布新”并“移动世界”（“谈进步”486）。尼采笔下的查拉图斯特拉曾声称，要在生命终结前把“最丰厚的礼物献给人类”，因为他懂得太阳在沉落之际，也是光芒积聚最为丰富之时；要从它“用之不竭的宝藏中掏出金子般的光芒撒向大海——乃至于最贫穷的渔夫也能摇起金色的船桨”（尼采210）。在这样的太阳喻说中，尼采、拜厄特和沈从文可谓不谋而合：他们在生命书写中收获愉悦，经历蜕变，由小我进入大我，实现了生命超越；既充盈了自身生命力，又回馈了他人，反哺了大千世界。这是一条向阳之路，即便“在一切有生陆续失去意义，本身亦因死亡毫无意义时”，也要“使生命之光，煜煜照人，如烛如金”（《向阳而美》62）。

由此可见，从追光者蜕变为照亮其他生命的缘光（*illuminator*），两位作家在生命体验和艺术创作的向阳之旅中，既形成了独特的生命美学，也构建了独特的文学艺术，而“文学就是一种伦理艺术”（Ni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190）。“美与善的统一才是真正完满的生命实现”，这不仅是两位作家在心灵深处的应和，更是“人类共同的希望和要求”（聂珍钊 王松林 113）。

三、生命书写中的“浴火重生”

要全面理解拜、沈二人的向阳生命美学，还需要关注他们创作中蕴藏的负面美学，重现被边缘化的生命体验，尤其体现在生与死、光明与黑暗、静默与流动，远行与归家等悖论之中。由此得知，两位作家生命美学中的向阳性充满张力，强调生命的意义不仅在于追求光明，更在于逆境中的向阳重生，这与他们作品中频频出现的“浴火重生”¹意象高度契合。

拜厄特的《枯干的女巫》取材沈从文作品中的蛊婆形象。女巫阿鸥因家庭悲剧沦为“灾星”，借助巫术自救并治愈村民，却因邻家儿子猝死和叔嫂恋情曝光后（曾为其制作过“爱的符咒”），被斥为“邪恶之源”，最终被缚于酷日下暴晒三日，灵肉分离。阿鸥的命运揭示了边缘群体的生存悖论：其巫术带来治愈希望（光明），又因巫术的隐秘性遭到排斥（黑暗），在光暗交织中挣扎直至魂归自然。

沈从文的《湘西散记》记录了上述故事的原型：蛊婆若使孩子“受蛊致死”，必被捉去“放在大六月天酷日下晒太阳，名为‘晒草蛊’（……）照习惯必在毒日下晒三天”（179、181）。沈从文在《凤凰》一文中曾为“蛊婆”辩护：“她根本上就并无如此特别能力蛊人致命。这种妇人是一个悲剧的主角，因为她有点隐性的疯狂，致疯的原因又是穷苦而寂寞”（《湘西散记》181）。沈从文坚信巫的产生有其“社会上的意义，都有它必然的

¹ 在《淮南子》天文训中提到，“火气之精者为日”，即太阳是由“火气”中最精华的部分凝聚而成，参见 陈广忠（译注）：《淮南子》，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04页。

原因”，而那些把蛊婆抓去晒蛊的读书人则属实“无知”（《湘西散记》185）。

沈从文对“蛊婆”形象的辩护在拜厄特《枯干的女巫》中得到了呼应。拜厄特进一步细化了该形象，淋漓尽致地呈现了人物的负面情绪、生存逆境与向阳生命力之间的张力。换言之，“负面美学”在小说中得以彰显——作品保留了湘西蛊婆的“怨愤郁结”与“压抑变态”（《湘西散记》177），且小说标题本身就暗示了女主人公生命中的阴影与厄运。国内有学者将标题译为《晒干的女巫》（徐蕾 161），但笔者认为“dried”一词若译为“晒干”，只顾及了故事的结局（女巫被抓去绑在树下暴晒三天），却亏损了另一层重要内涵，即女巫在人穷年老之际生命日益枯竭。文中出现“dry, drying, dried, dryness”等词，多达 50 余处，分别指称枯干的唾液、舌尖、双眼、皮肤、乳房、体液、血液，以及枯竭的生命欲望等。因此，“枯干的女巫”更能兼顾两层含义，并与小说中看似田园牧歌、溪水潺潺的自然环境形成反讽。再者，小说中“阴影”（shadow）和“黑暗”（dark, darkness）二词反复出现：女巫每次在水潭边洗衣都会见到自己在水中的“黑色面具”，不寒而栗。这方潭水源自“山林深处的一股清泉”（Byatt, “The Dried Witch” 85）¹，本应滋养万物，却如同死亡的黑渊²。周边环境看似世外桃源，实则阴影重重。女巫家中的环境也是阴暗局促，仿佛在暗示女巫的生活暗无天日。此外，与阿鸥同村的有一个名叫“昆”的男子，他如暗处的影子，时刻偷窥她的动静，最终借机挑唆村民，将女巫绑在烈日下暴晒致死。“昆”作为故事中阴暗卑劣的化身，与沈从文一直唾弃的“阴性人格”不谋而合，此类人“仿佛和平，其实阴险”（“白话文问题” 325），完全背离生命的本质。

拜厄特一方面渲染负面美学带来的阴暗面，另一方面又赋予女巫向阳重生的力量。小说中一个细节不容忽视：阳光下，阿鸥在水潭边擦洗铜盆时，发现盆面映射的自己与水中阴暗的脸不同，显得“圆润光鲜”，如“日光灿烂”（86）。这一幻象为枯槁绝望的女巫带来了生命之光。故事高潮，女巫于酷暑烈日下炙烤三日，实为点睛之笔。尤其是第三天，肉体折磨达到顶峰，但“她的灵魂之手在帮她舀起生命的热能，就如同沐浴于山泉”（110）。飘离的灵魂“聚集了长长一股热能和干燥的空气，盘旋在荆棘树周围”，使“银色、金色、暗红色”的枯枝焕发新生（110）；最终，“一股热浪形成的漩涡带着她的灵魂从泥泞的地上盘旋而上”（111），使“逐渐解体”的身躯“与天地相融”（109）。此过程直指“凤凰涅槃”的传说（源自古希腊罗

¹ 下文相关引文均出自 A. S. Byatt, “The Dried Witch,” *Sugar and Other Stories*, New York: Vintage International, 1992, 85-111。以下引文只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² 沉潭是封建家族对违犯族规的人施行的一种酷刑。在过去湘西一带，凡女子道德逾矩，常常以沉潭处罚。

马和埃及神话)¹。此外，故事中阿鸥反复出现的“红眼睛”(86、88、92)更强化了火凤凰的意象（相传凤凰具有红/金色的眼睛）。如同凤凰背负人世积怨投身烈火换取祥和，女巫阿鸥以生命为代价给年轻爱侣传递爱的符咒，独自承担全村怨念，于烈日中完成其涅槃重生。

拜、沈二人心灵的交集不限于《枯干的女巫》，沈从文所信奉的向阳生命美学也贯穿拜厄特其他的艺术创作。其作品反复呈现从向阳而美到浴火重生的图景：光暗相随，生死交叠，远行归家并存。例如，《尤金尼娅蝴蝶》中，亚当森和马蒂玩组词游戏最终出现“凤凰”(phoenix) (“Morpho Eugenia” 175)一词，暗合涅槃之意；亚当森从失意的庄园寄生者蜕变为兼具反思与关爱能力的科学家，其重返亚马逊丛林的历程，既是远行，也是归家，在“自我”与“他者”的转换中寻求个人与民族的新生。《占有》(Possession, 1990)更频现重生的意象：拉莫特与已婚诗人艾什相恋，她在诀别信中借诗人“弥尔顿的凤凰”(Milton’s Phoenix) (Possession 545-546)来隐喻为爱所做的牺牲，即为恋人与孩子幸福她选择永诀独居。此外诗人艾什(Ash)之名暗含“灰烬”与强大生命力的双重意蕴；其创作的史诗《北欧众神之浴火重生》描绘的生命树“伟大的白蜡”(the Mighty Ash)于灰烬中“隐隐酝酿/重生的希望”(Possession 261)。以往研究过多聚焦“占有”的爱情或历史维度，依笔者之见，其核心要义实为：生命的意义非在占有，而在历经劫难后保有对他人、自然和民族的关爱能力，以及与万物相生相融、重获新生的希望。

与拜厄特相比，沈从文的生命书写呈现出更加多元的形式：既有小说人物的生命抗争与超越，又有自传中从自毁到自救的生命历程，更有转向文物研究中的凤凰涅槃。不少学者曾探讨过《边城》《潇潇》和《长河》等小说中的悲剧美学特征及其成因，但大都只关注沈从文创作中呈现的负面情感结构²，却忽略了隐藏其中的生命张力，即绝境背后蕴藏的希望，死亡中孕育的新生。例如，《边城》中翠翠遭遇祖父死亡、恋人离去的悲剧，但结尾处的画面仍然向未来开放：“到了冬天，那个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那个在月光下“使翠翠在睡梦中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来的青年人”“也许永远不会来了，也许‘明天’回来！”(《边城》282)这里，圮坍又重建的“白塔”以及文末的“感叹号”都在预示“明朗、刚健的力量和生生不息的气象”(张新颖 17)。又如，沈从文自己曾陷入“精神失常”，却拼尽全力写下了自传散文《一点记录》：“一切必然要新生，旧的灭亡而新的兴起。个人得挣扎到阳光下来，将生命重新交给土地和阳光”(“一点记录” 6)。在他生命

1 参见 R. Van Den Broek, *The Myth of the Phoenix: According to Classical and Early Christian Traditions*, translated by I. Seeger, Leiden: E.J. Brill, 1972, 146-147+187.

2 知网上收录以“悲剧”“悲观”“悲音”“挽歌”等作为关键词的评论文章（以边城为例）多达 400 多篇。

的危机时刻，他依然努力向阳求生，即便在绝望中听到“翠翠也曾听到过的杜鹃啼唤”，也能看到“在生命的枯枝上，苗生了一簇簇新芽和新蕊”（“一点记录”9-10）。1949年后，他从文学创作转向物质文化史研究，并用凤凰重生来阐明普通民众的工艺美术何以流芳百世：“俗说凤凰不死，死后又还会再生（……）凡是深深活在人民情感中的东西，它的历史虽久，当然还会从更新的时代，和千万人民艺术创造热情重新结合，得到不朽和永生”（《古人的文化》119-120）。

综上所述，拜厄特与沈从文在“向阳之旅”中的“邂逅”看似偶然，实则必然。他们在向阳之旅中形成了独特的向阳生命美学，后者不仅源于他们对个体生命焦虑的深刻体验，也源自对民族生存困境的深切关注。在不同时空中，沈从文那颗“能为一切现世光影而跳跃的心”（《向阳而美》92）与拜厄特笔下灵动的白蜡树形成了奇妙的应和，两者均“能动能感觉，能看能听闻”，“生生不息”（*Possession* 261）。这种心灵的契合不仅体现为对生命活力的赞美，对生命意义的追求中，也深藏于他们对弱小生命的悲悯。他们都小扣而大鸣，与偌大的世界联结，融入了真善美境界，实现了生命美学与伦理担当。

Works Cited

- Barnhart, Robert K, ed. *The Barnhart Dictionary of Etymology*. New York: The H.W. Wilson Company, 1988.
- Blake, William. *Songs of Innocence and Experience*. New York: Penguin Book, 1995.
- Broek, R. Van Den. *The Myth of the Phoenix: According to Classical and Early Christian Traditions*, translated by I. Seeger. Leiden: E.J. Brill, 1972.
- Byatt, A.S. “The Dried Witch.” *Sugar and Other Stories*. New York: Vintage International, 1992. 85-111.
- . “Morpho Eugenia.” *Angels and Insects*. New York: Vintage, 1994. 3-183.
- . *On Histories and Stories: Selected Essays*. Cambridge: Harvard UP, 2000.
- . *Passions of the Mind: Selected Writings*. London: Vintage, 1993.
- . *Possession: A Romanc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0.
- . “Preface.” *Strange and Charmed: Science and the Contemporary Visual Arts*, edited by Siân Ede. London: Calouste Gulbenkian Foundation, 2000. 7-10.
- . *The Shadow of the Sun*. Orlando: Harcourt Brace, 1993.
- . *Still Life*. London: Vintage, 2003.
- . *Unruly Times: Wordsworth and Coleridge in Their Time*. London: Vintage, 1989.
- Campbell, Jane. *A. S. Byatt and the Heliotropic Imagination*. Waterloo: Wilfrid Laurier UP, 2004.
- 陈广忠（译注）：《淮南子》。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 [Chen Guangzhong (trans. and annot.). *Huainanz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2.]
- Corrigan, Kevin. "Light and Metaphor in Plotinus and St. Thomas Aquinas." *The Thomist: A Speculative Quarterly Review* 57 (1993): 187-199.
- Derrida, Jacques and F. C. T. Moore. "White Mythology: Metaphor in the Text of Philosophy." *New Literary History* 6 (1974): 5-74.
- Freud, Sigmund. "Uncanny." *The Critical Tradition: Classic Texts and Contemporary Trends* (Third edition), translated by James Strachey. Boston: Bedford/ St.Martin's, 2007. 514-532.
- 贺秀明：“西方文论关键词：生命写作”，《外国文学》3（2021）：100-109。
- [He Xiuming. "Life Writing: A Keyword in Critical Theory." *Foreign Literature* 3 (2021): 100-109.]
- 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
- [Heidegger, Martin. *Being and Time*, translated by Chen Jiaying et al.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4.]
- Hensher, Philip. "A.S. Byatt, The Art of Fiction No.168." *The Paris Review* 159 (Fall 2001). Available at: www.theparisreview.org/interviews/481/the-art-of-fiction-no-168-a-s-byatt. Accessed 9 July 2017.
- 金冰：《维多利亚时代与后现代历史想象：拜厄特“新维多利亚小说”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 [Jin Bing. *A.S. Byatt's Reconstruction of the Victorian Age in Angels and Insects*. Beijing: Peking UP, 2010.]
- Kelly, Kathleen Coyne. *A. S. Byatt*,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96.
-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王志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 [Levi-Strauss, Claude. *Tristes Tropiques*, translated by Wang Zhiming. Beijing: China Renmin UP, 2009.]
- 凌宇：《看云者：从边城走向世界》。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
- [Ling Yu. *Cloud Watcher: From Border Town to the World*. Changsha: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18.]
- 尼采：《善恶的彼岸》，朱泽译。北京：团结出版社，2001年。
- [Nietzsche, Friedrich. *Beyond Good and Evil*, translated by Zhu Yang. Beijing: Tuanjie Press, 2001.]
-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杨恒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年。
- [—. *Thus Spoke Zarathustra*, translated by Yang Hengda. Nanjing: Yilin Press, 2016.]
-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189-207.
- .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3-398.
- 聂珍钊：“人文研究的科学转向”，《文学跨学科研究》4（2022）：563-568。
- [Nie Zhenzhao. "The Scientific Turn of Humanities Studies."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4 (2022): 563-568.]

聂珍钊、王松林编：《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

[Nie Zhenzhao and Wang Songlin, eds. *A Study on the Theory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20.]

Noakes, Richard. “Spiritualism, Science and the Supernatural in mid-Victorian Britain.” *The Victorian Supernatural*, edited by Nicola Bowen, Carolyn Burdett and Pamela Thurschwell.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4. 23-43.

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

[Plato. *The Republic*, translated by Guo Binhe and Zhang Zhumi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6.]

沈从文：“抽象的抒情”，《沈从文谈艺术》。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11页。

[Shen Congwen. “Abstract Lyricism.” *Sheng Congwen on Art*.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4. 2-11.]

——：《阿丽思中国游记》。海口：南海出版社，2000年。

[—. *Alice’s Adventure in China*. Haikou: Nanhui Publishing House, 2000.]

——：《从文自传》。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

[—. *Autobiography of Congwen*.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4.]

——：《边城》。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

[—. *The Border Town*.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4.]

——：《古人的文化》。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

[—. *Culture of the Ancient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3.]

——：《从文家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

[—. *Family Letters of Congwen*.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4.]

——：《向阳而美》。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21年。

[—. *Heliotropic Aesthetics*. Beijing: China Pictorial Publishing House, 2021.]

——：“爱与美”，《沈从文全集》第1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59-362页。

[—. “Love and Beauty.” *Complete Works of Shen Congwen* Vol.17. Taiyuan: Beiyue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2. 359-362.]

——：“谈进步”，《沈从文全集》第1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79-488页。

[—. “On Progress.” *Complete Works of Shen Congwen* Vol.16. Taiyuan: Beiyue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2. 479-488.]

——：“凤凰”，《湘西散记》，杨宪益、戴乃迭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第170-205页。

[—. “Phoenix.” *Recollections of West Hunan*, translated by Yang Xianyi and Dai Naidie. Nanjing: Yilin Publishing House, 2009. 170-205.]

——：“白话文问题”，《沈从文全集》第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53-64页。

[—. “The Problem of the Vernacular Language.” *Complete Works of Shen Congwen* Vol.12. Taiyuan: Beiyue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2. 53-64.]

沈从文（沈虎雏整理）：“一点记录——给几个熟人”，《新文学史料》4（2014）：4-12。

[Shen Congwen (Ed. Shen Huchu). “Some Notes for Some Acquaintances.” *Historical Studies of Modern Literature* 4 (2014): 4-12.]

童明：“暗恐 / 非家幻觉”，《外国文学》4（2011）：106-116。

[Tong Ming. “The Uncanny.” *Foreign Literature* 4 (2011): 106-116.]

Travis, Peter W.. “Chaucer’s Heliotropes and the Poetics of Metaphor.” *Speculum* 72 (1997): 399-427.

汪曾祺：《一辈古人》。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

[Wang Zengqi. *A Generation of the Accents*. Beijing: Beijing October Arts and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2.]

吴投文：《沈从文的生命诗学》。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

[Wu Touwen. *Shen Congwen’s Poetics of Life*. Beijing: Oriental Press, 2007.]

徐蕾、拜厄特：“神话·历史·语言·现实：A. S. 拜厄特访谈录”，武畅译，《当代外国文学》1（2013）：158-165。

[Xu Lei and Byatt. “Mythology, History, Language, Reality: An Interview with A.S. Byatt.” Translated by Wu Chang.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1 (2013): 158-165.]

杨乃乔：“终极缘光：西方诗学本体论的‘向日式隐喻’”，《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1999）：62-73。

[Yang Naiqiao. “The Ultimate Illuminator: The Heliotropic Metaphor in the Poetic Ontology of the West.” *Journal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1 (1999): 62-73.]

张德明：《旅行文学十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

[Zhang Deming. *Ten Lectures on Travel Literature*. Beijing: Peking UP, 2021.]

张新颖：《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年。

[Zhang Xinying. *Shen Congwen and 20th Century China*. Shanghai: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24.]